

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

王海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

王海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 / 王海燕著.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308-10093-9

I. ①日… II. ①王… III. ①社会—信仰—研究—日本—平安时代 (794~1192) IV. ①B9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0531号

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

王海燕 著

责任编辑 葛玉丹

文字编辑 陈佩钰 (yukin_chen@hotmail.com)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3千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093-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本书出版承蒙浙江大学董氏基金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助

目 录

前 言 / 001

一 贵族政治的确立 / 003

平安时代“贵族”的范畴 / 003

贵族政治的结构 / 006

贵族政治的经济基础 / 024

二 贵族社会的动荡 / 039

权力争衡的历史 / 039

地方的反乱 / 061

三 平安京的生活 / 077

平安京的布局 / 077

平安京人的居住 / 088

贵族的生活 / 091

贵族的教育 / 094

四 古代日本国家的灾异认识 / 105

地震 / 105

疫病 / 113

凶年 / 119

五 佛教的传播 / 125

日本佛教的开端 / 125

奈良时代的佛教 / 134

平安佛教 / 146

六 平安时代的神道 / 163

倭王权的神祇祭祀 / 163

律令制下的神祇祭祀 / 167

平安时代的祭祀 / 171

神宫祭祀 / 177

神佛融合 / 184

七 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 / 195

年中行事的成立 / 195

正月行事 / 199

三月三日节 / 220

五月五日节 / 224

朔旦冬至 / 229

后 记 / 245

前 言

日本的平安时代，是指以平安京（今京都）为政治中心的时代，一般认为起始于794年平安京迁都，迄止于12世纪末。平安时代是以天皇为顶点的中央集权制逐渐走向贵族政治的时期。与8世纪的奈良时代相比，平安时代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抑或是在社会信仰方面，都有着独自的特质。然而，由于文献史料入手困难等因素，我国学者对于平安时代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或文化方面，史学方面的论述相对较少。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古代史学界关于平安时代的研究却有着庞大的先行研究积蓄。笔者力图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史学的视角论及平安时代的政治、社会和信仰，同时以年中行事为切入点，探讨平安文化中的中国因素。

本书由七部分构成：

一、贵族政治的确立。主要从摄关政治、政务处理方式和赋税征收体制等方面入手，叙述平安时代贵族政治的形成及其经济基础。

二、贵族政治的动荡。以中央的“政变”与地方的“反乱”为主轴，试论平安时代围绕中央权力的较量与平衡以及地方社会的不稳。

三、平安京的生活。以平安时代的政治中心地——平安京为中心，从居住、婚姻、教育等视点，阐述以贵族为主体的都市社会生活的面貌。

四、古代日本的灾异认识。以地震、疫病、凶年为切入点，依据文献史料，试论古代日本国家对灾异的认识以及应对措施。

五、佛教的传播。从佛教与王权的视点，对佛教的传入、国家佛教的形成以及平安时代新佛教的成立加以较详细的论述。

六、平安时代的神道。在概述古代日本的神祇祭祀的发展过程的同时，着重介绍贺茂神社、伊势神宫、神宫寺等平安时代的代表性神社的祭祀。

七、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以正月行事、三月三日节、五月五日节、朔旦冬至为考察对象，探讨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及其内涵的中国因素。

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时，出于祈望国家统治永世安稳的心愿，将都城命名为平安京。然而，在平安时代的数百年历史中，统治阶层的政治权力斗争、地方下级官人的不满、灾异的发生等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使得平安时代并不总是太平盛世。此外，一提起平安时代，人们往往会注目平安文化的独特性，而忽略中国文化的影响。但事实上，平安时代的贵族对中国文化的汲取丝毫不逊于奈良时代。在平安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信仰中，都不乏中国文化因素的存在。

本书只是择取平安时代政治、社会以及信仰中的若干侧面加以论述，对于立体地勾画出平安时代的全貌尚显不足，今后还需从更广泛的视角，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 贵族政治的确立

平安时代“贵族”的范畴

贵族政治的形成、发展以及衰退是平安时代近 400 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8 世纪初确立的日本律令制的位阶制度，从正一位至少初位下，共有 30 阶，其中三位以上者称为“贵”，四、五位者称为“通贵”，也就是说，五位以上皆被视为贵族。这些五位以上的贵族不仅在经济上、刑法上享有特权，而且依据他们各自的位阶，其子孙只要满 21 岁，就可以自动获得一定的位阶（即所谓的荫位制）^{〔1〕}，由此确保贵族的子孙能够比较快地升至与父辈同等的地位，以便于贵族阶层的延续。此外，律令制下的位阶与官职之间基本遵循官位相当制，即官与位之间相对应的关系，例如，左右大臣之职对应的位阶是从二位，大纳言之职对应正三位，大宰帅（大宰府长官）之职对应从三位，八省卿（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各省的长官）之职对应正四位，八省辅（各省的次官）之职对应五位，等等。由此，五位以上的贵族占据了律令制国家机构的中枢要职。

桓武朝（781—805）以后，朝廷开始将氏姓授予外戚、皇子、近臣以及有才能的官人，与以往的氏姓多源于地名或者神话传说不

同，新授予的氏姓大多是新造的氏姓，如滋野朝臣、滋善宿祢、源朝臣等，这意味着一个与天皇密切关联的、新的贵族集团的形成。

为了加强王族、贵族子孙的教育，大同元年（806），平城天皇发布敕令：

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十岁以上，皆入大学，分业教
习，依荫出身，犹合上寮，经一选□□□大舍人。但情愿
者听之。^{〔2〕}

依据此令，王族以及五位以上的贵族的所有子孙，只要年龄在10岁以上，都必须进入大学学习。在大学学习的学生，被规定必修《孝经》、《论语》二经，选修《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等。每门课每10天一次考试（旬考），年终再接受一次考试（岁试）。因此，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在大学修得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嵯峨天皇于弘仁三年（812）发布的敕令中，就明言对王族、贵族的子孙在大学的的学习状况表示失望，称他们是“朽木难琢，愚心不移，徒积多年，未成一业”^{〔3〕}。弘仁十二年（821），时任右大臣的藤原冬嗣为了帮助本氏族的人完成学业，设立了氏族的学舍——劝学院，以保证藤原氏的子孙能够顺利地出仕任官，从而延续藤原氏的贵族阶层。此后，其他有能力的各氏族也纷纷效仿藤原氏，设立本氏族的修学院，例如橘氏的学馆院，出自皇室的在原氏、平氏、源氏的奖学院等。与此相对，那些无法援助本氏族修学的氏族，其氏人的子孙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在贵族之外。

9世纪中叶以后，五位以上的贵族集团渐渐解体。首先，能够进入政治核心层的贵族范围逐渐缩小。^{〔4〕}在律令官制的组织结构中，

太政官是统辖国政的机构，由议政官、外记局（相当于议政官的秘书局）、左右弁官局（负责议政官与诸司、诸国之间的行政事务联络）等构成。其中，审议国政的议政官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中纳言以及参议（参议的位阶皆为四位以上）构成。平安时代以后，议政官的官人总称为“公卿”，而公卿的候补者，基本上都出自藤原氏、嵯峨源氏等特定的氏，即太政官的官职趋向世袭化。另一方面，那些与上层官人逐渐无缘的贵族或下级氏族中，也有不少凭借明经、纪传、明法等诸道学问，或者医、阴阳、历、武艺等特殊技能，获得可以接近天皇或上流贵族的官职。11世纪以后，学问性或技能性的官职作为特定的氏的家业，也成为代代相袭的世袭性官职。在这种官职世袭化的趋势下，既非出自上流贵族，又不具有专门学问或技能的氏族的人，甚至是具有五位位阶的人，只能在朝廷的官司或上流贵族的家政机关中，担任中下层职员或从者。

其次，宇多朝（887—897）时期，朝廷的新的身份制度——升殿制成立。所谓的升殿，是指可以登入天皇居住的清凉殿的南厢的资格。清凉殿位于平安宫内里（禁中）内，原来只是天皇日常生活的空间，后兼为天皇问政的殿舍。具有升殿资格的官人被称为殿上人，是近侍天皇的官人。五位以上的官人中，只有一部分被赋予升殿资格，而且每当新旧天皇交替之际，新天皇都要重新任命殿上人，组成围绕在新天皇身旁的近侍官人集团。升殿资格的有否，乃是体现官人与天皇之间亲疏关系的标志，将五位以上的官人集团分为天皇的近臣集团以及非近臣集团。属于近臣集团的贵族，不仅自身具有升殿资格，而且其未成人的子孙也被允许升殿（“童殿上”）。

随着五位以上的贵族集团的形骸化，贵族的范畴也越来越倾向于公卿、殿上人等官人集团。平安时代，由于政治核心层的官职世袭化以及依存于天皇的近臣集团的形成，天皇君主地位的稳固及其

政治上的统合作用，成为贵族政治延续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因此，表现君臣关系、上下关系的礼仪，尤为受到天皇与贵族的重视。即使天皇年纪尚幼，不问政事，但是在举行大尝祭等反映天皇统治正当性的礼仪时，幼年的天皇也必须出席，以强调其君主的地位以及君臣关系。

贵族政治的结构

摄政·关白政治

摄政与关白起源于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戚藤原氏的强势。天安二年（858）八月，32岁的文德天皇去世。年仅9岁的皇太子惟仁亲王继承皇位，即清和天皇。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幼帝诞生。年幼的清和天皇，自然是无法处理朝政的，因此他的外祖父——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大权在握，总揽朝政。贞观八年（866），朝廷发生了应天门之变事件。事件之后，已成年的清和天皇赋予藤原良房以“摄行天下之政”的权力。^[5]藤原良房死后，他的养子藤原基经继续辅佐清和天皇，处理朝廷大小政事。贞观十八年（876），27岁的清和天皇让位，继承皇位的是藤原基经的外甥——皇太子贞明亲王，是为阳成天皇，年龄也是9岁。清和天皇在让位的同时，命令时任右大臣的藤原基经“保辅幼主，摄行天子之政”^[6]。摄政之制由此创始。

元庆八年（884），年仅17岁的阳成天皇迫于藤原基经的压力，让位。光孝天皇即位，时年55岁。由于光孝天皇是具有执政能力的成年天皇，因此无法再设置辅佐幼帝的摄政之职。当时，藤原基

经已经位高至太政大臣。为此，光孝天皇召集文人官僚以及法律方面的专家讨论太政大臣的具体职掌。众人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太政大臣相当于唐王朝的“三师三公”，位于亲王之上，没有具体的职掌，但是可以统管一切。于是，光孝天皇敕诏宣布：太政大臣藤原基经具有辅弼天皇、总领百官的重任，无论是应上奏天皇的事，还是天皇下宣的事，都必须先咨禀藤原基经。虽然光孝天皇赋予藤原基经的权限不像摄政那样可以代行天皇大权，但是却能介入天皇对国政的决定及其实施。

仁和三年（887），光孝天皇亡故，21岁的宇多天皇即位。即位后不久的宇多天皇宣布：朝廷的政事无论大小都“关白”于太政大臣藤原基经，一如光孝朝时期，百官的上奏和天皇的下宣都经过藤原基经。^{〔7〕}“关白”一词源于中国，意喻通达百官上奏事宜和天皇下宣事宜。关白之制确立。

宽平三年（891），藤原基经离世。此后，宇多天皇实行亲政，没有再设置关白。其后的醍醐天皇时期（897—930）也没有设置摄政或者关白。延长八年（930），醍醐天皇让位，朱雀天皇即位。朱雀即位时，只有8岁，他的舅舅、时任左大臣的藤原忠平（藤原基经之子）以摄政的身份，代行天下之政。承平七年（937），15岁的朱雀天皇举行意味成年的元服仪式。天庆四年（941），藤原忠平被任命为关白，其地位、权限直追他的父亲藤原基经。天庆九年（946）四月，朱雀天皇突然让位，他的弟弟成明亲王即位，是为村上天皇。村上天皇即位时，年已21岁。藤原忠平依然身居关白之位，辅弼村上天皇。天历三年（949），藤原忠平去世，村上天皇亲政，没有再任命关白，但是重用藤原忠平的两个儿子——藤原实赖和藤原师辅。

康保四年（967），村上天皇去世，其子宪平亲王即位，即冷

泉天皇。冷泉天皇即位时，年纪18岁，其外祖父藤原师辅已经过世。即位后，冷泉任命其叔外祖父藤原实赖为关白。安和二年（969），冷泉天皇让位，他的弟弟——11岁的圆融天皇即位，藤原实赖就任摄政，辅佐幼主。翌年（970），摄政藤原实赖以71岁高龄逝去，圆融天皇的舅舅——时任右大臣的藤原伊尹（藤原师辅的长子）继任摄政。天禄三年（972），14岁的圆融天皇元服，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摄政藤原伊尹因病而亡。天延元年（973），圆融天皇的另一个舅舅——藤原兼通（藤原师辅的次子）就任关白。贞元二年（977）十一月，藤原兼通病亡，临终前，他把关白之位让给了时任左大臣的藤原赖忠（藤原实赖之子）。

永观二年（984），圆融天皇让位，皇太子师贞亲王即位，是为花山天皇。花山天皇是冷泉天皇与藤原怀子（藤原伊尹的女儿）所生之子。他即位后，继续任命藤原赖忠就任关白。宽和二年（986），花山天皇出家，藤原兼家（藤原师辅的三子）的外孙、7岁的怀仁亲王继位，是为一条天皇。一条天皇即位后，藤原兼家作为摄政，代替天皇处理朝政。

藤原兼家之前的每一位摄政或关白，在律令制下的大臣体系中，最终都位高至太政大臣。但是藤原兼家成为摄政之时，他的官职只是右大臣，其上还有太政大臣藤原赖忠和左大臣源雅信二人。对于藤原兼家来说，等待太政大臣之位的空出，似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于是，在就任摄政后不久，藤原兼家辞去了右大臣一职，同时将摄政的政治地位提升至相当于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高于三公（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的程度。由此，摄政成为独立于律令制大臣体系的职位，并且其地位超越所有的官职。

永祚二年（990）正月，11岁的一条天皇元服。同年五月，藤原兼家辞去摄政，改任关白。不久，藤原兼家出家，把关白之位让

给他的长男藤原道隆。此后，藤原兼家一族长期独占摄政或关白之位，以摄政·关白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达到顶峰，尤其是藤原兼家的五男藤原道长身为一、三条（藤原兼家的外孙）、后一条（藤原道长的外孙）三代天皇的外戚，势力无人比拟。而藤原道长的长子藤原赖通在后一条、后朱雀（藤原道长的外孙）、后冷泉（藤原道长的外孙）三代天皇时期，就任摄政或关白，50年间保持了藤原道长一族的荣华。

“政”与“定”

“政”是天皇或者太政官对诸司、诸国上申的事宜做出指示、决定的政务处理。律令制下的朝廷政务处理，原则上是天皇每日早朝时在大极殿听政，对中央诸官司、地方诸国上奏的重大事宜做出决定。在平安宫的布局中，大极殿之南设有朝堂院，早朝时，朝堂院是臣下着座或列立的场所。如果天皇出席早朝，可以从大极殿直接看到臣下在朝堂院处理政务的情景。平安时代前期，朝堂院的政务处理流程大致为：早朝时，官人们进入朝堂院后，各司的官人在规定的位置（朝座^[8]）就位，各自处理日常政务；弁官（弁、史）或外记向大臣依次宣读需要大臣裁决的上申文书（略称申文），经过议政官的讨论，最后以大臣的名义给出处理的意见（若大臣没有上朝，则由大纳言主持议政）；诸司的代表也可在弁官的引导下，直接向大臣请示政务。有些重大政务的处理，如果议政官无法做出最后的决定，还需要上奏天皇，由天皇做出最终的指示。^[9]

延历十一年（792）十月，朝廷将五位以上官人的上朝出勤日（上日）的计算方法，改为通计算出勤内里的日数，而不是单算在朝座的出勤日。^[10]这说明在当时，五位官人上朝的场合除了朝堂院以外，

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

还有内里，也就是说，天皇听政的场所从太极殿移至内里。随着天皇听政空间的变化，诸官司的官人也无需每日在朝堂院处理政务。

《延喜式》规定，每年的十一月至翌年的二月，朝廷的政务处理不在朝堂院举行，而是在各官司的曹司举行；而在三月和十月，也只有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3天在朝堂院举行政务处理。^[11]

平安前期，内里的正殿——紫宸殿是天皇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平安中、后期，天皇听政的场所又改为内里的清凉殿。原有的天皇每日听政也渐渐地变成旬政，即每月的一日、十一日、十六日、二十一日，天皇在内里的紫宸殿举行听政仪式，听政仪式之后，天皇设宴赏禄臣下。当然，平安时代也有少数天皇坚持每日听政，例如根据《日本三代实录》的记载，仁明天皇于在位期间（833—850）每天御紫宸殿，听政事。但是自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天皇了。甚至连旬政也渐渐地疏于举行。10世纪以后，多数天皇每年只是在二孟旬（孟夏的四月一日和孟冬的十月一日），形式上举行听政仪式，而且即使是这两次形式上的听政，天皇也会经常不出席。

随着天皇听政的次数越来越少，朝廷的日常政务就由太政官机构处理，也就是公卿（议政官）听政。在平安宫朝堂院的东侧，设有太政官曹司厅，是太政官的事务室。在此，弁官受理诸司、诸国的上申事宜，然后将需要请示公卿的申文上呈公卿，公卿们经过讨论，最终以上卿（出席公卿听政的官位最高者）的名义作出决裁。弘仁十三年（822），公卿听政的场所从太政官曹司厅移至位于内里近旁的太政官候厅（即外记厅，位于内里建春门以东）。外记厅的公卿听政与太政官曹司厅的公卿听政相比，二者只是空间不同，其政务处理的过程基本相同^[12]。外记厅的公卿听政（外记政），原则上，除停政日、休日以外，应该每日举行。外记政结束后，公